

从土耳其的过境移民 看国际移民体制的政治学

阿赫梅特·伊斯杜伊古

引言：国际人口迁移机制（简称 IMRs）

当今世界的人口状况有一些从前所没有的特征，其中之一便是国际移民的类型和模式发生了变化。例如，在涌向欧洲国家的跨国迁移人群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先进入欧洲的边缘地带，譬如东欧、西亚或北非等地区，然后再谋求从这些地方进入欧洲。这种从发展中国家到欧洲国家的人口流动的不断变化的特征，对于国际移民格局，对于各种类型的迁移所触及国家的权力分配，都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周边地区最近 20 年里出现的居高不下的过境移民，已经成为相关国家和国际议事日程上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便有大量来自亚洲、非洲、中东以及独联体的迁移者借道欧洲的边缘地区进入西欧国家。当时，国际移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简称 IOM）决定把它的“移

民信息收集计划”的工作重点首先放在分析这个问题上；最后，该组织就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波兰、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等国家的过境移民情况拟就了一系列报告。90 年代后半期召开的几次国际会议

也对欧洲周边国家的过境移民问题进行了讨论：欧洲国家关于迁入移民问题开展过几次讨论，说明上述问题的重要性。

本文拟就过境移民与国际移民政治的相互联系的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对国际移民体制的复杂状况进行细致考察。笔者将“体制”（regime）一词做极宽泛的定义：那是一套为某种利益运作、对权力和利弊进行分配的规范性系统。本文

认为，移民的全球化已促使跨国移民按照一种国际规范系统的形式而扩张。本文还认为，近期人口流动的变化方式是一系列相当复杂的互动的结果：各种互动因素同时或先后发生作用。这些因素包括迁移者自身的特点，他们所进入社会的特点以及他们所离开社会的特点。观察过境移民的情况以及它们与国际移民体制的各种联

阿赫梅特·伊斯杜伊古 (Ahmet Icduygu) 是土耳其毕尔肯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他近期的研究重点是国际人口迁移的成因与后果，少数民族或种族的社会人口状况，以及与国际人口迁移和文化多样化有关的公民身份问题。目前，他正同福亚特·基曼合作写一本关于“后民族公民权利”的专著。通讯处：Mr. Ahmet Icduygu,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Bilkent University, 06533 Bilkent, Ankara, Turkey; Email: icduygua@bilkent.edu.tr

系,我们不免会就移民活动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因为国际移民体制从根本上说是政治的产物或妥协;它们不仅反映了全球人口流动的变化,也影响着这一变化。

本文研究的个案是土耳其。因为土耳其早就归入欧洲的国际移民体制,所以非常适合做此类分析。应该指出,本文并不打算讨论过境移民的各个方面;限于本文的讨论目的,我们只需选择过境移民的若干基本特点,以说明国际移民体制。本文在讨论土耳其的过境移民的动力和机制时,拟着重描述国际移民体制的几个主要方面:移民的水平和模式;移民的来源地;移民的目的地;移民的特征。

背景

在最近 20 年,土耳其一直是国际人口过境迁移活动的主要当事国(Gokdere, 1994; Icduygu, 1996a, 128; IOM, 1995, 1)。成千上万的迁移者从伊拉克、埃及、摩洛哥、加纳、阿富汗等各处来到土耳其。他们打算在土境内暂居一时,然后再找门路迁移到土耳其西面的欧洲发达国家。他们移民土耳其有以下 3 个原因:(1)与土耳其邻近的国家或地区发生了政治动乱或冲突,当地居民为过太平日子而背井离乡;(2)土耳其在地理上是东西方、南北方的交会处,这使它成为移民欧洲的最好跳板;(3)“欧洲壁垒”政策对移民入境控制越来越严,原先瞄准欧洲的人只好改道去了欧洲的周边地区,如土耳其。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西欧各国与土耳其的关系一直交织着移民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在双边关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劳力移民以及 80 年代的家庭团聚,导致欧洲和土耳其之

间移民体制的形成。在 90 年代,过境移民和难民问题成为该机制面临的主要问题(Kirisci, 1994; ZFT, 1996)。这一时期,欧盟率先确定了一种新的移民和难民庇护体制。老办法较为通融,虽然挑肥拣瘦但能容纳来者,完全承认其身份,给予全部社会权利,使他们长期居留。新体制则极尽可能杜绝入境,对入境者抹杀身份减少权利,让他们匆匆即去(Joly, 1998)。

有“综合治理”计划,主张在欧洲的移民输入国之外采取行动,为避难者提供就地帮助,使他们在离家最近的地方安顿下来。这个办法通过国家间达成的重新接收以及“安全第三国”措施来实施(Joly, 1996),它很有可能对来自土耳其、前往土耳其、取道土耳其的移民产生深刻影响(Icduygu, 1995)。

90 年代初以来,迁入移民与难民危机一直是欧洲国家和土耳其议事日程的主要问题,今天,在讨论应该采取何种措施解决过境移民和难民问题时,它仍然是争论的焦点。本文以此为背景,考察了土耳其的过境移民和难民,评价了形成土耳其与欧洲国家之间移民、庇护和难民体制的更加广阔的环境,既而把过境移民问题同全球化的发展动态联系在一起。

根据公认的国际人口迁移分类法,迁移者可以分为 6 大类(Appleyard, 1991, 1995):(1)永久定居者,(2)临时合同工,(3)临时专业雇员,(4)非法劳工,(5)寻求庇护者,(6)难民。其实还可以再加上一类——过境移民,这些人来到此国,心里想的却是彼国。切须留意的是,虽然过境移民一般都有特定的移民背景,但其他几类移民也有过境的情况。例如,偷渡入境的劳工或非法劳工、寻求庇护者、难民和过境移民常常兼有多种身份;换句话说,过境移民是多种类型迁移者的混和体。所以,建立

过境移民概念所依照的类型学,不仅要考虑移民的意向,还要考虑整个过程的动力和机制。

虽然人们已经对不同类型的国际移民作了大量研究,但对国际环境下过境迁移的持续研究却微乎其微(Icduygu, 1996a; IOM, UNHCR and OSCE, 1996)。当然,研究不同类型的移民可以为研究过境移民提供一些启发和借鉴,但国际移民绝少完全相同的类型,显然有必要比现在更加深入地了解过境移民活动,因为这其中包含有特殊的结构和过程。此外,对于输出、接待和容留迁移人口的国家,我们有必要了解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特点。

就理论角度而言,有三点应当指明:第一,总体认识移民过程是很重要的,包括过境迁移各阶段,如迁移前的背景、实际过渡和重新定居等等之间的联系;第二,应该从历史角度观察移民;第三,要在总体之中确定和思考个体迁移者的位置。

关于国际迁移和迁移者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我们不妨把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分为四个研究领域:一是迁移的缘起,二是造成其长期稳定性的因素,三是移民劳工的使用,四是移民对接纳社会的适应(Portes and Bach, 1985, 3; Portes and Borocz, 1985, 606)。一般而言,迁移原因是前两类研究关注的问题,迁移后果则是后两类研究的核心(Morokvasic, 1984, 17)。而过境移民则二者得兼。过境迁移者自身的角色便可以揭示原因与后果间的密切互动、相互转换。他们受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有身不由己的一面。但他们在故国和他乡也有自己的抱负盘算、人生计划,也要对社会有所改变(Joly, 1998)。

如今有种共识,即当代移民有助于改变一些概念的内涵,比如像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公民权、多元文化观、居住、国籍、

社区、身份等概念,以及因全球化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等等(Icduygu, 1996, 150)。以往民族国家的迁移体制,基本上是按照冷战时期以国家为中心的逻辑设计的;如今随着移民向多层次发展,个别国家已不大容易控制,上述体制也就越来越成问题,越来越缺乏效益了。移民随之被视为安全隐患,在许多涉及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话语中频频出现(Icduygu and Keyman, 1998; Kirisci, 1994)。

土耳其的例子很有说服力。这个民族国家没有行之有效的移民政策,却深受欧洲国家移民和难民政策及实践的影响。另外,土耳其之所以是一个理想的个案研究对象,是因为它的迁出移民率很高,同时又承受了难民和过境移民(Icduygu and Keyman, 1998)。

土耳其的过境移民

官方统计数字的主要依据是土耳其国家统计局汇编的数据资料。在过去20年间,即1979—1999年,有5500多万外国人进入土耳其境内,其中大部分是游客;旅行的主要目的是休闲、度假、省亲、经商之类。但也有一部分人打算在土耳其作临时或长期居留,还有一部分抱着前往或移居第三国的目的来到土耳其。官方的统计没能对入境者做可靠的分类,也未说明不同类型迁移人群的人数差别。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从80年代初以来,前往土耳其的外国人有了急剧增加。

1979—1999年间进入土耳其的5500万外国人中,1/4稍强是1989年之前入境的,剩下的3/4则是1989年之后。换句话说,第二个10年比第一个10年增加了两倍。除了旅游人数增加之外,外来者中有意在土耳其落户或者借道土耳其前往第三

国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为了更好地了解土耳其的过境移民,我们先来看一看近年来进入该国的难民情况。难民流动虽然和其他过境流动不同,但是了解前者会有助于理解后者。土耳其是1951年日内瓦《关于难民地位公约》的签约国之一,但它接受该公约附带了一个地理限制,即它履行的义务只限于为来自欧洲国家的人提供避难,而对于非欧洲籍的避难者则不承担此等义务。鉴于冷战时期土耳其执行的反共政策,这一地理限制便意味着土耳其只向来自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公民提供避难者身份;又因为当时的西方国家坚持兑现其安置逃离共产迫害者的承诺,土耳其便一直成为难民去往西方的跳板。

直至最近,进入土耳其的避难者人数和难民人数一直稀少而零散,来源地也仅限于东欧;被接受为难民的人都受鼓励而移居西方。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CHR)的统计,1945—1991年期间,从东欧及前苏联进入土耳其的避难者不超过8000,其中一半是1979—1991年这段时间来的。这项统计没有明确指示这批避难者实际被接受为难民的比例,但他们中的大部分很可能最终离开了土耳其前往第三国。

1980年以来,土耳其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数以千计的避难者涌入境内,他们大部分来自中东国家和地区,少部分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一些距离较远的地方。土耳其因为没有关于非欧洲籍避难者地位的专门法规,便依据本国关于外国人入境的普通法律予以处置,也就是说,依照本国的法律,土耳其要求入境的外国人必须持有有效证件,必须在容许的期限内离境。鉴于各类事实上的难民不断增多,土耳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实际而灵活的处置方式,使

难民享有一定程度的保护。因为有这样的条件,许多逃离霍梅尼政权的伊朗人虽然不具有适当的旅行证件和居留许可,也能进入土耳其国境并在那里停留。

大批涌入土耳其境内而又不属于日内瓦公约所列类型的难民,是伊朗人——也可以把他们视为过客。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成千上万的伊朗人逃到土耳其寻求庇护。有些人持有效证件,有些则没有;大多数入境者打算利用土耳其作跳板,最终去往西方国家。根据土耳其的现行法规,这些伊朗人并不属于日内瓦公约所定义的难民,土耳其只能允许他们以旅游者身份按常规延长在土境内停留时间。

只有一小部分伊朗人选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渠道前往第三国定居,大部分伊朗人试图利用个人关系找到去西方国家的门路。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说明进入土耳其的伊朗人的实际数目,但广为流传的说法是:约有100万伊朗人已经利用土耳其作为再度迁移的跳板。据估计,现在仍然居住在土耳其的伊朗人约有一二十万。

人数居第二位的过境移民主要是1988—1994年期间入境的伊拉克人,他们又可分为三股。第一股在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时来到土耳其。迫于伊拉克政府的军事打击,约有5万名库尔德族游击队员(peshmergas)携其家眷在1988年8月的最后一周进入土耳其。同样还是因为签署日内瓦公约时土耳其有履行公约的地域界限,从伊拉克迁入土耳其的人一律被视作“临时过客”而不是寻求庇护,并且还被要求尽早离境。土耳其不愿意给予这些伊拉克库尔德族人难民地位,因而也不允许联合国的难民救济组织与库尔德人直接联系,为他们提供援助和保护。库尔德游击队员及其家眷都被收容在靠近伊拉克边境



伊斯坦布尔旧城区街景,1996年。Antoine Agoudjian 摄影/ Rapho 供稿。

的临时难民营里。土耳其方面督促他们回国或到西方国家寻求庇护。其实,有项调查显示,寄居难民营的 27 028 名伊拉克籍库尔德族人中,有 26 873 人打算到西方国家定居(Kirisci, 1994, 52)。但西方国家不愿意收容他们,而更希望他们以难民身份留在土耳其。西方国家的官员还指责土耳其没有善待这些难民,尤其提到了难民的居住设施以及所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的数量和质量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既然表露出不愿接收难民到它们那里定居,土耳其政府便批评西方国家无意分担对难民的义务。

由于土耳其政府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上述矛盾,所以从 1988—1991 年初,只有少数寻求庇护的库尔德族人离开土耳其去往西方。自 1991 年 4 月开始,1988 年进入土耳其的难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与 1991 年 4 月上旬逃进土耳其的大批同胞一起,返回了设在伊拉克北部的安全区。1988 年进入土耳其的难民自愿遣返行动一直持续到近期。与此同时,总数为 5 万人的难民中有近 2 500 人离开土耳其,前往伊朗和叙利亚,只有大约 3 000 名被接受为难民,最终在西方国家定居。

第二股移民来自伊拉克,包括原先在伊拉克和科威特工作的外籍工人,在海湾危机期间他们要逃离这两个国家。将近 6 万名外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在 1990 年 4 月—1991 年 4 月间跨越伊拉克边境逃到土耳其。他们大部分来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土耳其后,被临时安置在靠近伊土边境的一处营地。在难民来源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做出了必要的运输安排后,这批难民不久便离开了土耳其。

最近一起由伊拉克大规模涌入土耳其的事件发生在 1991 年 4 月中旬。约 50 万库尔德族人为了躲避伊拉克的军事打击,

逃进了土耳其与伊拉克交界的山区。在经历了 1988 年难民大批入境的困难之后,土耳其政府极不愿意向这些难民开放边境,但当时的局面已经很难控制。与 1988 年的情况相比,国际社会这次的反应迅速了许多。首先,土耳其促使发达国家对此次迁移的巨大规模给予关注,敦促西方国家实施大规模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计划,解决入境难民的吃住问题。第二,土耳其积极支持在伊拉克北部设立安全区,并发起了难民自愿安全遣返计划。其结果是,约有 50 万库尔德族难民从土耳其边境的高山上下来,回到了土伊边境伊拉克一侧的平原。

虽然许多来自伊拉克的入境者最后离开,但是他们还是把一部分人留在那里,而且致使更多的伊拉克人迁移到土耳其。本次迁移的主体是库尔德族人,也有不少阿拉伯人、迦勒底人和土库曼人。例如,在 80 年代后几年—1991 年早些时候,土耳其大约有 8 000 名伊拉克籍寻求庇护者,主要为阿拉伯人、迦勒底人和土库曼人。8 000 人中约有一半设法到了西方国家,并在那里定居,另一半获得了居留许可,待在土耳其。

1989 年,除了其他几支进入土耳其的迁移人群之外,还有 31 万多保加利亚籍土耳其人逃离保加利亚的高压政权到土耳其寻求避难。这是那一年人口迁移活动的特别之处。再后来,这批难民半数以上返回了祖国,只有很少一部分设法到了别的国家。

除了来自伊拉克和伊朗的中东难民流以外,还有来自非洲、亚洲其他国家的避难者以及其他过境移民。这是这一时期人口迁移的重要动向。关于这部分难民的人数目前还没有完整而可靠的统计数据,但根据记载,1983—1991 年间,有 380 名避难

者来自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利亚、索马里、苏丹等国,有 940 名避难者来自亚洲的阿富汗、中国和斯里兰卡。然而笔者认为,从亚非国家来土的难民人数远远超过上面的数字,因为很多亚洲国家的难民是在没有合法证件的情况下进入土耳其的,他们非法入境,同时也打算非法出境。据估计,90 年代中期,在土耳其的非洲籍过境移民有 2 000 名,亚洲籍过境移民有 750 名。90 年代后期,非洲籍迁移者达到 5 000 多人,亚洲籍迁移者也超过了 1 000 人。总体估计,自 80 年代后期以来,有 3 万多名过境移民来自阿富汗、苏丹、菲律宾、斯里兰卡、加纳、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亚非国家。

较近的过境移民中有一支来自波斯尼亚。第一批波斯尼亚难民在 1992 年下半年来到土耳其;他们中间有些人持前南斯拉夫护照以旅游者身份入境,而多数人未持有合法有效证件。绝大多数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来到土耳其之后与亲戚或其他波斯尼亚族后裔的土耳其人生活在一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打算移居西方国家。目前还没有这一时期进入土耳其的波斯尼亚人的准确数字,但据可靠资料,他们的人数在 2 万至 2.5 万之间。后来有超过 3/4 的波斯尼亚人返回故国,只有一小部分(近 2 000 人)与在土耳其的亲友待在一起。许多迁移至土耳其的波斯尼亚人起初便有移居西方的打算,后来他们在西方国家获得了难民身份,据估计这批人在 5 000 左右。

最近的过境移民是来自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难民。1999 年,大约有 2 万名阿尔巴尼亚族人到土耳其寻求庇护,其中多数把土耳其当作难民的临时收容所。后来,这批迁移者中大约 1 000 人仍生活在土耳其,绝大多数返回了家园。

最后说一下来自前苏联、东欧国家兼

有经商和旅游双重身份的人。这部分人虽不能视同过境移民,但经常出入土耳其周边国家,实际已经构成土耳其过境人群的一部分。90 年代,这类人数增长甚多。在这 10 年里,从这些国家来土耳其的人员总数有了显著增长,从 1989 年的不足 6 万人增加到 1999 年的近 300 万,多数人既是商人也是游客。

土耳其的过境者

1995 年对土耳其过境迁移人口所做的研究(IOM, 1995),包含对生活在该国两个主要都市区——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的 159 名男女过境迁移者详尽系统的调查结果。之所以选择这两个地方考察,主要是因为它们那里的情况很能代表在土耳其出入境的主要过境迁移群体的状况。在此,我们将 1995 年调查取得的发现总结如下:

被访的过境迁移者约有 3/4 是男性,近 70% 在 17—30 岁之间,只有 10% 超过 40 岁。每 5 人中有 3 人为独身。70% 来自城市,67% 接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半数以上(67%)在本国有全时工作或在校,但对其工作或将来的就业机会非常不满。约一半被访者说他们原先在本国做蓝领工作,2/3 的人认为在国内的收入属于中等。调查结果证实,选择迁移外国的人中多数是年轻的、出身于城市且受过教育的男性,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感到不满。过境迁移经常是单身行动,虽然很多人已有家室。收集到的数据资料显示,只有 1/4 的迁移者打算或试图把亲属带到土耳其。

过境迁移者大多来自中东地区,其中伊拉克人占 1/3 以上,伊朗人占 1/5,来自非洲的被访者也占 1/5,波斯尼亚人占

10%，亚洲其他国家的人仅占6%。土耳其族人占调查者总数的1/5，他们之中的大部分是来自伊拉克的土库曼人，若干非洲国家的迁移者也占1/5。迁移人群的第三大民族是伊朗人，占样本总数的14%。库尔德族人、阿拉伯人、波斯尼亚人各占9%。

超过半数的迁移者称，他们是迫于“政治压力”来到土耳其的。经常提到的政治压力有武装冲突、民族压迫、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政治局势紧张。经济动机也是头等重要的原因。有超过1/5的被访者说来到土耳其是出于经济动机。来自伊朗、伊拉克和波斯尼亚的被访者一般强调迁移的政治原因，而非洲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被访者则强调经济上的考虑。

在土耳其停留不满一年者占过境迁移人口总数的不足60%，但有10%的迁移者已在该国居留了4年以上。伊朗迁移者在土耳其的居留时间平均约4年，伊拉克迁移者为26个月，波斯尼亚迁移者为21个月，非洲迁移者为13个月。调查进行之时，仅有8%的被访人表示想在土耳其待下去；21%的被访人曾经做过离开土耳其的尝试，但没有成功，92%的人仍在筹划离境。调查资料显示，过境迁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本国经过土耳其迁移到目的地，平均大约需要4年时间。许多迁移者说，筹划向土耳其迁移花去了大约一年时间，现已在土耳其停留了差不多两年了，目前打算下一年离开土耳其到最终目的地。

过境迁移的费用很高，全部费用包括由本国达到土耳其的资费，加上从土耳其转到最终目的地的资费。途经土耳其的过境迁移总费用估计为3700美元。这笔钱有很大一部分要花在行贿上。例如，有将近一半的被访者为了到达土耳其在本国或者在与土耳其相邻的某国的边境上花钱

行贿。进入土耳其之前，平均用于行贿的费用为430美元，最高达3000美元，最低为5美元。37%的迁移者不得不在土耳其境内行贿，在土边境一侧的行贿支出平均为270美元，最高达3000美元，最低5美元。25%的被访者打算在土耳其行贿，行贿的平均预算为2400美元；12%的人打算在达到目的地国家时行贿，平均预算为4500美元。从土耳其迁移到最终目的地，迁移者用于行贿的钱数差别很大，从100美元到10000美元不等。因各民族的迁移途径不同，迁移费用也有差别。例如，非洲人的迁移费用较低，平均为1950美元，而亚洲人的迁移费用较高，平均为3900美元；因为前者大部分是藏在轮船上来到土耳其的，而后者则要经过较长的行程。

每5个被访者中就有2人进入土耳其时没有持护照或其他有效的旅行证件。无有效证件而入境者中超过2/3的人是伊拉克籍的库尔德人、迦勒底人和土耳其人。无证件非法进入土耳其的迁移者，几乎全都得到过非法贩运者和走私者的帮助。被访者中有13%打算在离开土耳其之后、到达目的地国之前，利用另一个国家作为跳板。土耳其和目的地国之间的主要过渡地，除了土耳其的邻国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罗马尼亚、西班牙、伊朗、叙利亚之外，还有较遥远的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国。作为最终目的地的国家主要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欧洲各国。斯堪的那维亚诸国、荷兰、英国、意大利和希腊，是迁移者的首选。非洲籍迁移者大部分希望做海员。在尝试前往希腊、目前仍意欲前往的迁移人口中，他们是主体。约80%的被访者说，在选择最终目的地时他们会考虑是否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机会；也有70%的移民称，政治、社会和文化因

素是他们选择时要考虑的重要方面。16%的被调查者正在考虑去那些签证发放条件相对宽松的国家。

只有1/3的被访者说他们会考虑回国这条路。有1/3的迁移者决心移居国外,并且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把回国作为一条选择。而剩下的1/3称,如果具备某些条件他们也可以回国。大多数迁移者(80%)说,如果他们国家的经济、政治状况改善,他们是愿意回去的。大约每5个人中就有1人提到,如果有人能支付旅费,他们会考虑回国。这一比例在非洲籍迁移者中达到了70%。

当被问到如果事先知道要遭遇现在所有的问题或困难是否还会离开自己国家时,有2/3受访者回答“会”。这一比例在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的迁移者中间非常一致。回答“会”的移民里有93%决心离开土耳其去往别国,虽然他们中间72%的人第一次离开土耳其的努力已告失败,20%的人已经历了两次失败。

结束语

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所论述的那样(Icduygu and Keyman, 1998),紧锣密鼓的全球化进程,促使我们对于以国家为中心处置国际移民问题的方法作出反思。全球化进程有可能使国际移民问题变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多维度问题:我们如果拘泥于种种惯用方法,便无法把握这一问题不断变化的实质。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注意探索和认识全球化与国际移民动向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上构建起来的。笔者在本文中把研讨焦点放在了土耳其的人口过境迁移这一个案上,正是试图获得上述方面的认识。依笔者之见,土耳其是受到全球化显著影响的几个重要地区之

一。

过境移民已成为欧洲国家的国际移民体制一部分,在本文结束时,我们不妨就土耳其近年来过境移民的动力和机制提出以下两点意见。

第一,前面的讨论已经充分说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土耳其过境移民数量不断增加这一情况是现实存在的。尽管还缺少直接证据来说明当前的迁移状况,但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2000年以后土耳其还会存在类似的移民现象,只不过有些起落罢了。近来有些数据显示土耳其境内的过境移民数量会继续呈现小幅下降之势,但下降速度不可能很快,也不可能持续不变。在中东、亚洲及非洲相关地区的政治、经济状况毫无改善的情况下,在潜在迁移者与其生活在外国或国内的亲戚朋友所构成的移民网络继续存在的条件下,在迁移人口接收国越加需要人力资源的条件下,移民的变化会放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移民人数的居高不下。在这方面起关键作用的是位于世界发达地区(位于西、北半球)的移民迁入国针对来自发展中国家(东、南半球)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

第二,在对入境移民以及寻求难民庇护执行严格限制政策的国际大环境下,面对具有广泛基础的国际移民体制采取区别对待措施,势必会助长过境移民的发展。在过去的20年里,过境移民的趋向已经十分明显。例如,许多过境移民已经进入欧洲周边地区,土耳其境内的过境移民便是上述趋向的例证之一。

20世纪80—90年代,欧洲国家和土耳其之间的几次人口迁移活动虽然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每一次迁移活动也是各具特征的个案。简而言之,国际移民体制仍然是多样的,它们为几个关键的参与者(即迁

移者、输入国和输出国)的利益服务,反映着世界移民市场上的各种动力和机制。因此,欧洲国家和土耳其之间并不存在单一的国际移民体制,而是多种机制并存;由于迁移者、原住国和目的国三者间的互动,这些机制呈现交错重合的状况。故而我们说,土耳其过境移民已经形成了其特有的迁移体制。

这种移民体制的一般特征可以分三个层面加以总结:其一,它在个别迁移者的流动性和国际移民市场的需求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关系;其二,它疏通了移民输出国和

输入国之间的关系,即作为中心与边缘的竞争关系;其三,它在(移民的输出、过境和接收)国家之间分配了权力。显然,我们需要另作研讨,专门评估这三个层面。这种研讨必须把体现在国际移民领域中各种研究实践所使用的数据和理论框架综合在一起。只有在这种环境下考察国际移民各种机制以及它们同不断变化的国际移民格局之间的联系,才可能为全面细致地研究当前国际移民动向树立一种范式。

(张大川译)

Notes (注释)

1. See, for instance, IOM (1994a, 1994b, 1995).
2. See, for instance, IOM, UNHCR, and OSCE (1996).
3. Part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transit migration flows in Turkey

here was previously reported by the author of this essay in IOM (1995).
4. For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the recent refugee flows into Turkey see Kirisci (1994). The discussion here benefited largely from Kirisci's study.

5. This section of the present essay is largely based on the following two studies: IOM (1995), and İçduygu (1996a).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APPLEYARD, R. 1995. 'New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umbers, Directions, and Dynamic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uroconference on 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London, August 30-September 2, 1995.

APPLEYARD, R. 1991.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allenges for the Nineties*, Genev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GOKDERE, A. 1994. "An Evaluation of Turkey's Recent Migration Flows and Stocks", *Turkish Journal of Population Studies*, 16: 29-56.

IÇDUYGU, A. 1996a. 'Transit Migrants and Turkey', *Review of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tudies*, 10: 1-2, 127-142.

IÇDUYGU, A. 1996b. 'Citizenship at the Crossroads: Immigr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E. Kofman and G. Youngs (eds.), *Global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inter, 150-162.

IÇDUYGU, A. 1995. 'Refugee Pressure Versus Immigration Pressure in Europe: The Perspective From a Sending Count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uropean Population Conference, Milano, September 5-11.

IÇDUYGU, A. and KEYMAN, F. 1998. 'Globalization, Security, and Migration: the Case of Turke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allenges for European Populations, Bari, June 25-27.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1995. *Transit Migration in Turkey*. Budapest: IOM Migration Information Programme.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1994a. *Transit Migration in Hungary*. Budapest: IOM Migration Information Programme.

I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1994b. *Transit Migration in Russian Federation*. Budapest: IOM Migration Information Programme.

IOM, UNHCR, and OS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s for Refugees, and Offic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1996. *CIS*

Conference. Geneva: UNHCR Public Information Service.

JOLY, D. 1999. 'Some Structural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Receiving and Sending Countries', Euromed Meeting Expert on Migration and Human Exchanges, The Hague. 1-2 March, 1999.

JOLY, D. 1998. 'Temporary Protec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 New European Asylum Regim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2 (3): 49-76.

JOLY, D. 1996. *Haven or Hell? Asylum Policies and Refugees in Europe*. Basingstoke: Macmillan.

KIRISCI, K. 1994. "Refugee Movements and Turkey in the Post Second World War Era". Istanbul: Bogazici University Research Papers, ISS/POLS 95-01.

MOROKVASIC, M. 1984. 'Trend Report, Migration in Europe, Introduction', *Current Sociology*, 32 (2): 17-40.

PORTES, A. and BACH, R. L. 1995. *Latin Journey*.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ORTES, A. and BOROCZ, J. 1985. "Contemporary Immigratio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its Determinants and Modes of In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3 (3): 606-630.

ZFT (Zentrum für Türkeistudien). 1996. *Immigration Country Turkey*. Essen: Zentrum für Türkeistudien Publication.

三种巨大的、出乎意料的移民运动出现在该地区:第一种,在该地区内部前所未有的跨国人口流动;第二种,地区外人员入境;第三种,过境前往西方的过境移民。这三种现象对正经历移民潮的这些国家有着直接的、有时是重大的影响,激发了它们政治上的特殊反应。

[祝东力译]

独联体近期移民趋势

詹娜·扎扬柯夫斯卡娅

本文根据官方统计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考察了前苏联在90年代初解体之后独联体(CIS)移民模式的变化,并且分析了造成这些变化的种种因素。本文内容不仅包括独联体各国之间的迁移,而且包括它们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迁移。本文特别关注俄罗斯族和其他族群的回归、难民和流民的被迫迁移、劳工移民流、非常规移民,以及被逐民族的回归等等。

[李存山译]

从土耳其的过境移民

看国际移民体制的政治学

阿赫梅特·伊斯杜伊古

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移民一直是西欧国家与土耳其的关系的显著问题。80年代和90年代,过境移民和难民庇护成为主要的迁移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为争论的热点。本文以此为背景,对土耳其境内的过境移民和难民群进行了考察,对土耳其与欧洲之间形成迁移、庇护和难民体制的更广阔的背景进行了评价,并将过境移民问题同正在发展的全球化联系在一起。本文还对过境移民与国际移民政治的联系进行了探讨,为此而认真考察了国

际移民体制的政治方面。“体制”一词可宽泛地解释为一定利益运作并能够分配权力和利弊的一种规范系统。文章认为,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已经对国际移民活动在一种国际规范系统内的扩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张大川译]

亚太地区跨国移民之动向

罗纳德·斯凯尔顿

本文在叙述了古代亚太地区的人口流动现象后,主要关注近半个世纪的移民状况。移民的原因被归结为四种:目标国的移民入境政策;外部强权的干预;中东的发展;以及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自身的经济开发。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讨论了最近以来人口流动的主要影响。当前,亚洲移民的问题主要是全球化时代的主权受到挑战以及跨国社群的出现,还有非法移民也是亚洲政府特别关心的问题。情况表明,东亚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经济衰退对该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甚微,跨国移民将继续成为亚太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因之一。

[祝东力译]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际移民问题

及最新趋势

阿得兰提·阿得泊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迁移具有多种形态,最常见的是地区内迁移,这些移民包括移民工人、非法移民、游牧民、边境工人、难民和高技能专业人员。由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的恶化,迁移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非正常迁移增加、迁移路线多样化,移民中出现贩卖人口的现象。男性的迁移有选择且得到资助,女性自主迁